

报告文学 • 文艺通讯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

王有盛

1105755

目 录

• 赤 心 篇 •

雪化方见松高洁.....	3
大洪山的“野人”.....	13
李旭啊，李旭.....	25
为了创造一小块阴凉儿.....	31
抓“转化”的强手.....	39
微山湖上静悄悄.....	56
“预备号”驶入航道.....	63
黎家山寨育苗人.....	74
309个小时.....	83

• 群 星 篇 •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	91
贫脊山区的一片绿洲.....	111
骑在沙龙背上.....	127
茵茵芳草地.....	137
面向每一个学生.....	146
护花曲.....	156

• 凝 思 篇 •

宝钢提出的课题.....	171
开山斧的故事.....	182
蚂蚁岛纪行.....	194
华西晨光.....	198
在莱茵河畔	
——西德普通教育考察散记之一.....	202
秋叶簌簌	
——西德普通教育考察散记之二.....	210

·赤心篇·

茫茫黑夜，漫漫森林，迷失了方向的人们，脸上露出绝望……突然，一个年轻人，划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燃烧着的红心，将它高高擎起。那红心放射出炽热的光。于是，黑暗隐去；于是，人们又迈步向前……

我们的教师，就是神话中的英雄，他们高擎着燃烧的红心，引导着一代人……

他们是火神，把智慧之火播遍人间；

他们是时代的桥梁，知识和文明在他们的身躯上延伸……





雪化方见松高洁

当我摊开稿纸起草这篇通讯的时候，久久地写不下去，久久地。感情的浪涛冲击着我的胸怀，是那样狂暴，那样激烈，泪泉的闸门关是关不住了。压抑、愤懑、沉痛；感奋、仇恨、敬佩……它们紧紧地拧在一起，拧得我心发痛。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在祖国大西北的银川郊外，一颗子弹穿透了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位普通教师的胸膛。他，五十岁的朱守忠同志倒下去了，倒在他深深热爱着的宁夏的土地上。大街上枪毙人的布告出来了，罪名是“反革命抗改犯”，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

十年前塞外那冷酷的枪声，今天还震响在耳际，那股红殷红的血迹，似乎在逼视着我们，催我们思考和回答：朱守忠同志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保证千千万万个“朱守忠”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

人们啊，都请想一想。

(一)

朱守忠的一生，有长长的一段路程象是蹒跚在一条荆棘丛

生、崎岖坎坷的山路上，他则象是颠簸在风浪上的一叶小舟，茫茫大海，一浪更比一浪恶，最后小舟被浪涛吞噬掉……

一九二〇年，朱守忠诞生在上海市金山县一个破落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一九四三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人民大众的苦难，这活生生的现实，使年轻的朱守忠觉醒起来，很早就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他在上海复兴中学当教员时，就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教协”，为解放大上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五〇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后上海知识分子中的第一批新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都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视导员，上海市初等教育师资训练班副主任，上海市第一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

想不到朱守忠命运的风帆驶到这里，被狂风摧折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学校领导成员之一，他反对漫无边际的扩大化，不同意“搞得人人自危”。因此，一下子，在反右斗争中“动摇退却”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行政职务。

这年，上海市从各区抽调五百多名教职工，编成“支宁大队”开赴宁夏。朱守忠作为大队成员之一，离开生活了三十八年的大上海，离开了妻子儿女，来到偏远的中卫县当初中数学教员。他怨吗？他恨吗？不，他认为，人虽然离开了党的组织，但心还是党的，他相信党总有一天会向他伸出温暖的手。他坚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着自己。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倾注在学生身上。他精心备课，教案写得一丝不苟；他细心批改学生作业，就连一个错用的标点也不放过，他的教学质量是过硬的。

一九六一年朱守忠的问题得到甄别，上海原单位上级党委通知朱守忠说，恢复了他的党籍。朱守忠几乎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欢乐和幸福，他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向党组织补交他积攒了几年的党费。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且慢，等上海的正式批文。

可惜，“批文”不会有了，那个待批的文件压在上海市委某部长的抽斗里，一压就是几年，到一九六四年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它已变成了一张废纸。

不久，又一个恶浪向朱守忠漂摇在海上的命运之舟扑来。一九六五年社教运动开始，他被开除了公职，要“清理回沪”。失去党组织的巨大伤痛还在烧灼他的心；现在又要离开他热爱的学生、热爱的教育事业了，他的心沉得象铅，珠泪纵横，难于自抑。

他三番五次地找领导人提出要求，他说，不要把我赶回上海吧，我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我愿靠双手以自足，体力劳动以终身。就这样，他被安排到学校农场，住在一间茅草棚里，每天抬粪、种菜、喂猪。工资没有了，每月领八元钱的生活费。他的妻子打电报来催他回上海，好心的同志也劝他回上海，但他不改变主意，他说：我不能自动放弃考验，我不离开组织……”

一九六五年六月，学校农场也不收留他了，以“无法支付八元生活费”为理由，把他送到自治区某农场。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总部”发布“一号通令”，朱守忠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地主分子”、“坏分子”两顶帽子，赶到生活条件很差的盐池县农村——狼窝沟落户。

一九六七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中卫中学的同志发现强加于朱守忠的两顶大帽子在档案材料中无据可查，派人到狼窝沟找出他来。这时，他已经面目皆非了：青胀浮肿的

脸，佝偻弯曲的腰背，破烂的棉衣，霜染的双鬓，使人难以辨认。

转年，朱守忠带着申诉材料回到上海。可是，在他的面前，家，已经解体了；他想找的老领导，打倒的打倒，专政的专政。多少工厂不生产，机关不工作，学校不上课，整个大上海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斗、斗、斗……国家、民族的危难已经这样深重，个人的得失何足挂齿？朱守忠把申诉材料一撕两半——从此再也不提个人的事！一个忧国忧民、正直坚定的战士决心投入战斗，他又返回了宁夏。

这就是朱守忠的一段履历，这就是朱守忠命运之舟的一段航程——一段并不值得留恋的痛苦的航程。可是，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守忠，对于个人长期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从无半句怨言，他的赤诚的心仍然热爱着党。

(二)

朱守忠被送进“五七干校”——设在贺兰县集中“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劳改农场。

在这里，他思考，他探索，他斗争。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刚直不阿，义正辞严，表现了一位优秀党员高度自觉的革命精神。

他公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怎么会一下子跑出两个司令部来？”他说：“刘少奇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好党员！”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拿出刚刚发表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念了又念，然后问朱守忠同志：

“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

“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阵毒打之后，又问。

朱守忠的回答同样斩钉截铁。

有人威胁说：看他敢不敢写出来？

朱守忠尽管被打得浑身是伤，但他还是怀着无限的崇敬和热爱，以大无畏的气概，当场在一张纸上写下“刘少奇是党员”六个大字，并郑重地签了名。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对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国家主席，竟如此受尽屈辱，每想到这里，就难过到极点，胜同身受。”

他从不参加那些早请示、晚汇报等拜神活动。他说：“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仪式繁琐，我看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毛主席当偶像、佛爷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

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衷心热爱，对他们遭受无辜迫害，仗义执言，多次公开站出来鸣不平。

他对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之流怀着满腔的仇恨和轻蔑：“什么江青？蓝蘋！蹩脚的三等明星，算是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原来是《王老五》的配角，今天一跃而为中央头目，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有谁服气？我就不理这一套！”

他说：“叶群在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是干啥的，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象这样做法，岂不成了‘夫妻老婆党’？”

这些话他都是公开讲的。有人向他提出严重“正告”，好

心的同志也在背后劝阻，可是，他说：“骂我，打我，批我，斗我，都不在乎。个人恩怨，我全不计较。我可以向任何人弯腰九十度鞠躬行礼，也可以五体投地地跪倒在众人面前。但要我放弃维护党的威信，说违心的假话，我做不来，也办不到”。“我受过党的教育，不能不坚持原则，要怕斗，我就不叫朱守忠了！”

在六十年代末那些阴沉得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朱守忠坚持这样的观点，发表这样的议论，会有什么结果？农场头头经过紧张的“讨论研究”，觉得那些揪头发、扭胳膊、“坐喷气式”、拳打脚踢的“批斗会”也不宜再开了，因为这会给朱守忠提供“放毒”的机会。于是，朱守忠被锁进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实行隔离。在这间小屋里，朱守忠没有放下武器，他借写“检查交待”的机会，一口气写下了几万字的材料，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写道：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了更多更多说不尽的原因而外，还因为：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其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诚、坦白、正直、积极、守信守纪、任劳任怨的。尤其身为全党的领袖，更应该处处为人表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治党、治国、治天下。固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要辩证对待……”

这么一来，他又被禁止写东西了，连“检查交待”也不准写了。他被赶到集体大屋里去，不许和任何人讲一句话。

然而，锁，可以锁住他这个人，可以锁住他这张口，但怎么

能锁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火红的心？怎么能禁锢一个忧国忧民之士的思想？一九六九年四月，看了那个“划时代”的“九大”公报后，朱守忠偷偷地写下了他的感想、看法和预言：

“我对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有不同看法的，理由是——

“1. 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竟被以最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2.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在暴力冲击下，已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发展的党员，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一概无效。当然，就更没有资格当代表。入党不是拉伙，开党代会不是讲‘大世界’白相，阿猫阿狗全选了进去，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对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的莫大污辱！

“3. 我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因为这意味着将错就错，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这是钻死胡同，有进无出，长久不了。

“4.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箱。”

这样一针见血，这样痛快淋漓，这样旗帜鲜明，这样富有远见，就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也是令人折服的。然而，在当时，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命运将会怎样？他写的这些东西当即被人查抄，三天后，一副手铐卡住了朱守忠的手腕，他被送进了看守所——他的生命之舟的最后一站。

(三)

进了看守所，朱守忠仍然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说：“我进看守所，心里亮得很，思想定得很。我的情绪一直很愉快。但只有一条：历史将会证明谁是谁非！”

几个月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送进牢房。他照样毫无顾忌地向同狱的犯人们阐发他对形势的看法，谈笑风生，潇洒自如。胆小的犯人们吓得捂起耳朵来，可是，他还是照样说。他照例拒绝参加“早请示”、“晚汇报”，他说：“仪式繁琐，作法过火，象教堂里诵念圣经，我始终反对，坚决抵制！”

他没有一点“认罪服法”的表示！由于“违反监规”，他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虐待。朱守忠借机要求写“检查交待”材料，被允许了。他无比珍惜这次有限的机会，有效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伏案疾书，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愿望，他的忧虑。作为一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他毫不含糊地提出：“教育革命今后怎么搞，我还不理解，反正不能光念《语录》，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我看还是少不了的。”

他清楚地知道这么干会招致什么后果。果然，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付沉重的铁脚镣砸在他的脚腕上，他进了禁闭室。这意味着什么，朱守忠是心明如镜的。

已临生命旅程中的崖头了，向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然而，为了捍卫真理，朱守忠坚定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在审讯室里，审判员历数他的“罪状”，他一条也不争辩，相反，他还每每为之加以补充。审判员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答道：“没有了，死

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

回到狱中，他没有与人生诀别的哀痛，没有悲伤，随着大墙外边传来的除夕之夜的零星的爆竹声，他赋诗五首，其中一诗歌道：

以牢为家高枕卧，
美曲新歌由我谱，
杀头枪毙算个啥？
视死如归不在乎！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那个寒冷的，令人诅咒的日子里，最后一排恶浪拍来，朱守忠生命之舟被吞没了。他深情地告别了党，告别了人民，从容地履行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最后的义务。

* * *

十年过去了。朱守忠那股红的血迹早已被风风雨雨洗刷掉了。然而，从他那似火的丹心里发出来的真理的声音并没有消逝。他那数万言关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各个领域的卓见真识并没消逝。

历史在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前进。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受广大人民爱戴的刘少奇同志恢复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五月，宁夏自治区党委推倒了林彪、“四人帮”之流强加于朱守忠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纠正了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对朱守忠同志的不公正处理，并发出了《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在隆重的追悼大会上，自治区教育局负责同志沉痛地说：“朱守忠同志的不幸逝世，使我

们党失去了一位赤胆忠心、又红又专的好干部，是我区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是啊，这不仅是自治区的，也是全国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啊！

敬爱的读者，我们不会忘怀朱守忠；但更不要忘记朱守忠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用肝脑涂地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吧！

（一九八〇年六月）

大洪山的“野人”

孙伯英是湖北省随县大洪山区一名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

在那些“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他不受愚弄，不怕强权。不管野心家、阴谋家们刮什么歪风，掀什么恶浪，他巍然挺立，从不随波逐流。挨过上百次的批斗，住过山洞当过“野人”，两次坐牢受刑，吃尽了皮肉苦，受尽了精神折磨，但他，硬是顶着“死保刘少奇”的压力，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坚持斗争，寸步不退，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用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正气歌》。

挺身而出

一九六六年，北京掀起一个所谓“三家村”。“上边一阵风，下头一层浪”，照此逻辑，洪山中学的支部书记、校长和总务主任就成了洪山区的“小三家村”。洪山中学一夜之间就成了“修正主义学校”、“国民党学校”。全区教师被集中起来搞“运动”，声讨、批判“小三家村”。兴师动众，杀气腾腾，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乌云压城”之势。孙伯英，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普通小学教师，迎着烈火熊焰，挺身而出，他，什么都不怕。在他

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正直人的心，一颗受党的培养教育的忠实战士的心。他说，我要讲公道话。他根据自己曾经在洪山中学任教时的实践，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写了《洪山中学是社会主义学校》的万言书，为三位挨批的同志仗义执言，为人民教育事业仗义执言。

孙伯英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成了众矢之的。

不久，上边下令，把他从地处集镇的洪山小学调进山里鲍集小学，以示惩处。

“史无前例”的风雨一经开始，祖国的天空就不见晴朗的天气了。灾难一天天升级。他心目中那些最值得崇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被打倒，这使他痛心至极，愤怒至极！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掩藏自己的情感，不论在什么场合，凡是把“打倒”这个字眼儿同刘少奇同志的名字联在一起喊口号时，他从不举手。《论修养》被打成“大毒草”，他反而学得更认真，更刻苦，不光在背地里学，还公开地读。

从那场浩劫中走过来的人们，可以想象：在那年月里，象孙伯英这么干，会招致怎样的后果。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一天，孙伯英被拉到洪山镇。在一阵乱哄哄的“打倒”声中，他被推进会场，要他接受批斗。

为了“触及”他的“灵魂”，前一天晚上，“造反派”们已经把他捆在柱子上折磨过半宿了，此时他身上是累累创伤。他无力地站在台上，无神地望着这一切。突然，他象一头狮子，不顾一切地朝墙边冲去。原来，他看到一条把“打倒”两字同刘少奇这个光辉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标语。在人们还来不及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瞬间，他已经把那标语扯碎，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垂手站立，似乎说：“我没事了，任你们斗吧。”孙